

从二元性到二重性的飞跃

——对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的解读

史秋霞,王开庆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8)

摘 要 探寻吉登斯从二元性到二重性飞跃的轨迹对当前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从本体论出发对社会科学所面对的世界予以澄清,接着就此世界中的关键要素——行动与结构进行重新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新型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逻辑。最后,提出双重解释学来应对社会的复杂性,以及现实生活与专业性世界的交互性。

关键词 二元性;二重性;结构;共有知识;双重解释

中图分类号 C9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9)03-0059-04

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并不在于任何古老问题的消失,也不在于各个有冲突的学派中一方或另一方优势的增减,主要在于提出和认识各种问题的方式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的趋势^[1]。自社会学诞生以来,在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 3 种截然不同张力的作用下,西方社会学理论得以迅速发展。其中,以自然科学为标准模式的实证主义一直占据优势地位。自创始人孔德、斯宾塞到传承人迪尔凯姆皆认为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无本质差别,均可用因果规律加以解释。20 世纪 30 年代,帕森斯创立的结构功能主义,更是成为 60 年代前西方社会学界经典研究范式。以韦伯为代表的解释社会学,则认为社会现象具有独特规律,单纯效仿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无法探寻到社会现象的本质,因此需要重新建立研究框架。马克思统领的批判社会学则认为社会学的任务是批判性的检视现实社会;主张将社会现象置于总体的社会、历史长河中进行分析,并根据总体中的角色与作用确定其性质与规律。多元化的理论视角虽然有助于学科成长,但长期分离对立致使社会学缺乏整体的学科面貌,呈碎片化的发展趋势。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实证主义的主导地位受到广泛抨击,尤其是后经验主义理论、批判理论与解释社会学。但如解释社会学所带有的哲学传统研究缺陷,使其无法担当起与仍旧强大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相抗衡一样,可以说社会学在没有很好地走出自诞生以来就存在的历史困境的同时,又面临了现代

化向全球化转型的挑战,从而使得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危机陷入更为复杂的境地^[2]。

20 世纪 80 年代,以欧美社会学家为线索的西方社会学研究开始不断寻求主体与客体、宏观与微观等各类二元范式的整合,吉登斯的《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则视为致力于整合能动和结构的重要著作。书中,吉登斯基于对传统社会学研究取向的严厉批判,重新诠释了结构与行动、生活世界与社会科学专业性世界、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行动概念的重新界定,结构二重性的提出,不仅破除以往或“强结构弱行动”或“强行动弱结构”的二元研究取向,而且建立了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新型逻辑。在社会元理论层次上,“双重解释学”则重申了社会科学独特的研究性质与任务,著名的“结构化理论”可视为新规则的具体应用^[3]。可以说,吉登斯所建立的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实现了二元性向二重性的飞跃。在此,笔者将通过以下线索,来探寻其飞跃的轨迹:①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面对着怎样的世界?②这个世界是如何得以形成与维系?③作为研究者,我们如何得以认识这个世界?

一、社会科学所面对的世界

不同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构成了不同的社会研究范式,其中本体论又是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因此,探寻飞跃轨迹需要从其本源出发,即社会科学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个世界具有何种

收稿日期 2008-12-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6CSH008);河海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2007420811)

作者简介 史秋霞(1982—),女,内蒙古乌海人,博士研究生,从事城乡社会学研究。

特征？

吉登斯将关注与人类行动‘解释性理解’相关的语言及意义问题的学派，统称为解释社会学，如存在主义现象学、常人方法学、后维特根斯坦哲学、批判理论等，并进行了批判性回顾。综合现象学‘生活世界’的概念，吉登斯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所面对的研究‘世界’有很大差别，社会科学探讨的不是一个“预先给定”的客观世界，而是一个由主体的积极行为所创造的世界。然而，以自然科学研究逻辑为基础的实证主义不仅相对忽视了这种差别，而且希望社会科学能够如自然科学般对人类社会进行精确解释。吉登斯认为：“社会科学应该从自然科学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无论后者披着什么样的哲学外衣……如果社会科学就是要将自己的认识论和希望看作类似于自然科学，那么任何这样的取向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且只能导致对人类社会的有限理解”^{[4]34}。

自然界虽经受着人类的社会性改造，但这种改造活动并未创造自然界本身；人类社会性的改造自然界，而且通过‘人化’自然改造着人类自身，但是，他们当然没有制造这个独立于人类存在而被构建为客体世界的自然界”^{[4]77}。同样，基于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而构建的各类理论也并没有影响其本质特征；如果说在改造自然世界的过程中，人类创造了历史并因此生活在历史中，这只是因为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并不像在低等生物中那样‘生物学规划’。^{[4]77}对于社会，它的形成虽然不是某个个体行动的结果，但却是作为社会成员的所有个体共同参与的结果；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必须被认为是社会成员的技能型实现，而不仅仅是一系列机械的过程。^{[4]77}在此，每一位健全的社会成员都是实践的社会理论家，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与社会研究者凭借同样的资源来理解社会及行为的意义。因此，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家所运用理解社会行为的方式不再是‘独特’的，而是一种‘共有知识’，因此，对任何社会现象进行的描述本身也就成为一种改造。

作为吉登斯由二元性向二重性飞跃的本体论基础，以上对社会科学所关注的‘世界’予以澄清，紧接着需要探寻的问题则是这个由主体行为积极建构的世界是如何得以形成的。

二、能动、结构与再生产

文军曾提到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的一段话：“无论是否喜欢、是否了解，社会学家都要根据预先确定的假设来组织自己的研究，社会学的特点就是依赖于这些假设，并随这些假设变化而变化。而要探讨社会学的特点，了解社会学是什么，就要求我们

去辨认那更深一层的关于人与社会的假设”^[5]。在西方社会学世界中，结构与行动的关系一向是理论研究的关键，也是区分不同流派的重要标准。基于对以往理论传统的建设性批判，通过重新阐释行动、结构概念，以及二者的关系，实现向二重性的飞跃。

1. 重新阐释：行动

传统理论中，英美功能主义、法国结构主义与解释社会学对行动的研究可以总结为两种倾向。功能主义、结构主义总体上强调结构对行动的制约作用，即使是帕森斯的‘行动参照框架’也不过是将行动等同简单的需要支配；帕森斯的‘行动参照框架’中没有任何行动，只有需要支配或角色期待下的行为。舞台是固定的，行动者只根据已经替他们写好的剧本进行表演”^{[4]76}。解释社会学则将行动概念与举动认定的概念逻辑地相关于意图；相当多的哲学家认为行动概念本质上以意图概念为中心，也就是必定会涉及‘目的性行为’的问题”^{[4]60}，将有意图的举动等同于有意图的后果。这既忽视了行动的连续性，也掩盖了其具有的建构能力。

基于对以上传统理论的批判性回顾，吉登斯重新阐释了行动及特征。首先，在他看来：“行动是一种‘生活体验’的连续流，将它范畴化为离散的部分和‘碎片’依赖于行动者注意力的反思过程或类似的方面”^{[4]61}。其次，行动不同于举动，举动是行动已完成的部分，是人们对行动反思时分解成的某些片段或离散部分，而行动则是一种连续流，是物质存在对世界事件进行过程的、现实或预期的、有原因介入的连续流。如果说行动连续流强调行动的时间特性，那举动则强调行动的空间特性。再次，将行动与意图、理由和动机进行区分。行动不同于有意图（目的）的举动，后者只是前者一种有限的逻辑类型；理由则是行动的基础性原则，能动者把这些原则作为自己行为进行反思性监控的常规因素而与之“保持联系”，而行动的合理化是具有资格能力的行动者在行事时“维持通晓”行为根据的能力；在能动者反思性监控他们行为的背景之下，谈及行动的合理化十分恰当”^{[4]73}。动机是对行动的一种可能激发，但在日常惯例行动中，动机的激发因素并不予以考虑，人们可以很好的依据各种约定俗成的惯例、规则行动；只有在常规遭破坏；本体性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动机的激发才成为一种需要。可见，在吉登斯努力澄清行动与目的等诸概念的过程中，也展现出行动的结构层次；第一，是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以便行动者能够了解自己在其中活动的物质及社会环境；第二，行动的合理化过程，这意味着发展出能使行动者有效处理其社会生活的常规来；第三，行动者的动机

和动力,这涉及推动行动者去行动的种种愿望,最后人的行动还受制于许多未意识到的行动条件^[6]。

吉登斯认为,所谓行动的“理性化”并非是时时刻刻依赖于行动者的反思监控,日常生活中的诸多行为凭借的是常规。结合许茨与加芬克尔的“常识理解”,吉登斯提出“共有知识”,认为正是共有知识的存在,使得行动者不必时刻对其行为进行反思监控,协调着外界环境与个人间的关系。在此,“共有知识”也将行动者与外界环境相结合。在陈述目的与行动的脱节情形时,吉登斯提出一个对社会理论非常重要的概念来说明行动的建构能力,即“有意图举动的未预期后果”。有意图的举动也并不意味着目标达成,目的与行为间存在脱节情形:行动者可以达到他们想要达到的意图,但却不是通过他们的能动行为,有意图的举动特有地引起一系列的后果,这种后果可以被合理地认定为行动者所做,但是实际上他们并不希望这样。有意图举动的未预期后果,一个是有意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另一个是在有意获得的结果的地方也导致了其他一些结果^{[4]165}。正是“未预期的后果”的存在,构成了下一步行动未被认识到的条件,从而使得与外界环境相连的行动同时也与实践概念直接相关,即行动本身具有建构能力。

2. 重新阐释“结构”

在大多数的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看来,所谓行动只是行动者在社会结构控制下进行的机械被动行为,而结构则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模式化对个体行为具有强制作用;“这里没有在行动者层次上为主体的创造能力留下空间,所以在解释制度化的价值标准自身转换的缘由上,就存在一个主要困难……因为他们都不得不将价值标准(规则)视为一种给定^{[4]192}。”对帕森斯而言;秩序问题’的确是一种合乎规范的管理,是一个控制问题^{[4]195}。而解释社会学虽给予行动者主体能动性,但由于几乎没有办法应对诸如强制性、权力与大规模的社会组织问题,也无法承担起一统天下的重任。

吉登斯将行动理论与制度结构的性质分析相联系,对结构概念予以重新界定,即结构二重性。吉登斯认为:“①人类能动行为的领域是受到限制的;②但不能简单的认为结构是对人类能动性的限制,它实际上也是对人类能动性的促进。^{[4]278}结构二重性不仅肯定了结构对社会行动者及其行动具有的强制性与某种程度上的不可选择性,也强调对主体及主体的能动性有细微确切的理解。结构二重性的提出为超越二元性提供了基本元素支持。

吉登斯认为结构总是能够从结构化的角度得到

审视,因此我们将继续关注这种既是行动条件又是行动结果的结构具有哪些构成要素?

由主体构成的社会互动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作为“有意义的”构成,作为道德秩序的构成,作为多种权力关系运作的构成。首先,有意义的互动依赖于特定时空内所形成的解释框架运用,日常生活中的“共有知识”就以解释框架的形式被应用。然而,特定情境下的解释框架既作为不言自明的“背景知识”参与互动,也在互动过程中被社会成员不断地改变,又不属于“背景”。其次,规则的特征并非如自然主义立场所说的强制性,也非许茨、温奇等主张的授权性,而是二者的结合。因此,规范的制裁不同于以往所理解的机械性惩罚,其可能被参与者以“功利主义”的方式对待;“一个行动者可能恰恰会用与她或他对待技术性指令同样的方式对待道德声称;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个体也可以根据逃避惩罚的可能性来‘计算’包含在一种特殊举动中的‘风险’^{[4]208}。同时,规范秩序的生成同意义生成有着密切关系,违反的内容可潜在协商,而它被描述或认定的方式也影响其可能受到的惩罚。对规范的这种解释与互动中参与者做出的“解释性”算计能力及他们对道德所声称的顺从巧妙地联系在一起。最后,权力与行动有密切联系,可视为行动的改造能力。作为一种互动特性,权力是确保获得结果的能力,但结果的实现同样有赖于他人的行为。因此,对权力的理解,并非如帕森斯“行动参照框架”中的单纯支配,更不是常人方法学中对其作用的忽视,而“必须根据行动者能够运用权力的差别,强调意义框架的创造是作为实践活动的中介发生^{[4]214}。社会理论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必须发现社会互动中权力和规范的相互适应。

3. 新型的社会再生产逻辑

澄清了社会互动的方式与结构特性,有关社会再生产逻辑也初见端倪,为解决简单的二元关系,吉登斯引入了一组中介(在以上论述中略有提及),即促使行动与结构发生相互作用的中介因素(或“式样”),分别是认知秩序下的解释框架,支配秩序下的工具使用,合法秩序下规范的运用。如前所述,意义的交往包含解释框架的运用,借助此框架,被参与者各自的言说和行为被制造出来。这种解释框架是在共有认知秩序下使用的,而当行动者使用这种解释框架促使行为产生时,也重塑了宏观认知秩序背景。同理,在互动的权力中,包括共有支配秩序下工具的运用,同时这种运用也改造了其所依据的支配秩序。在互动的道德中,包括来自合法秩序的规范应用,而也正是这种应用重构了合法秩序。通过这种以“式样”为媒介行动与结构的互动方式,完成了社会的再

生产。同时,吉登斯认为,可以将意义的结构、支配的结构、合法化的结构分析为语法规则系统、资源系统、道德规则系统,且这三者间有着密切联系。

三、从二元性到二重性

以上笔者就“所面对的世界如何”、“这种世界如何得以形成与维系”进行了系统阐述,从中可见,通过对人类社会、行动、结构、社会再生产的重新界定,吉登斯实现了从二元性到二重性的初步飞跃。在此,笔者将通过对“如何认识、解释这个世界”的剖析,进一步其探寻飞跃轨迹。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为建立一种特殊描述图式所进行的实践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生活形式。然而,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所具有的本质差别,使得社会学探讨的是在社会行动者本身已经构建的意义框架范围之内的领域,“社会学观察家并不能使社会生活变成是仅供观察的‘现象’,并将自己关于社会生活的知识看作是建立‘调查主题’的资源。”^{[4] 279}因此,社会研究者在认识、解释世界时的立场与普通社会成员没有任何差别,都是建立在“共有知识”基础上。这明显不同于许茨的“适当性假定”^[5];许茨的这种表达建立在社会科学的技术性概念必须能够还原为日常行动的普通概念这一命题基础之上,但实际上这一命题未必有效,甚至必然是相反的情况:与其说社会学的概念不得不根据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概念来演绎,还不如说真实的情况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能够首先掌握这些生活概念,也就是说,他或她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洞悉想要分析或解释的生活形式的特征^[6]。作为研究者,必须能够“沉浸”于所要研究的生活方式中,才能对此生活形式进行描述。所谓“沉浸”,并不是成为存在于某生活形式中的真正成员,而是“了解如何找到能够作为实践总体的一部分而参与其中的方法。”^{[4] 279}

“共有知识”与沉浸解决的只是认识、理解普通生活世界中的意义框架,作为社会科学的观念型架构,还应在专业层次上将描述转化为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即社会学概念来源于双重解释;社会学在普通语言和专业性语言之间进行协调,从而在它自己的理论图式中重新解释了这些意义框架^{[4] 280}。同时,世俗世界与专业世界的联系是双向的,因此存在常识与专业理论的交互现象:在运用的过程中,产生于某一主题的专业概念及理论同时成为改造此主体的构成性因素,从而影响到先前所运用的概念与理论。这种专业知识向世俗世界的连续“滑移”,潜在地损害了社会科学专业知识的“科学性”,这可以部分解

释为何社会科学的权威要明显的低于自然科学。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吉登斯由二元性向二重性飞跃所做的努力。首先,从本体论出发,其认为社会科学所面对的世界不是“预先给定”的客观世界,而是由主体的积极行为所创造的世界;在此世界里,一切社会行动都是由结构与行动之间的互动构成。其次,通过澄清行动与举动、意图、目的、理由与动机间的关系,赋予行动以连续性与建构能力;通过结构化角度重新审视了结构特性——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的双重特征。在此基础上塑造了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新逻辑,即由“式样”为媒介形成了意义的交往、互动的权力、互动的道德^[3]。结构化过程完成了社会再生产的使命。最后,通过澄清生活世界与专业世界间的关系,吉登斯认为社会学概念遵循双重解释,即社会科学知识是“共有知识”前提下通过专业性概念的新意义框架内进行的重构。笔者认为,吉登斯虽然通过行为、结构互动的视角分析社会系统,但过于简约化的论述方式,难以展现社会系统的多元化特征。此外,虽说分析过程中融入全球化视角,但所谓的结构二重性对大范围互动的解释力却非常有限。

总之,吉登斯这种解读社会及其发展的全新方式,缓解了自功能主义后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混乱局面,其独特的社会存在与维系观点,双重解释性的定位,更为社会发展与变迁、全球化等议题提供了全新的方法指南。

参考文献:

- [1] 王微.欧美社会学传统及其对当代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4):41-44.
- [2] 文军.全球化议题与社会学研究[J].社会科学辑刊,2002(5):41-48.
- [3] 金小红.吉登斯的“双重解释学”与社会学理论批判[J].国外社会科学,2004(2):16-20.
- [4]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M].田佑中,刘江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 [5] 文军.历史困境与现实挑战:当代西方社会学研究面临的主要危机[M]/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田佑中,刘江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
- [6] 于海.结构化的行动,行动化的结构[J].社会,1998(7):46-47.
- [7] 刘江涛,田佑中.从二元性到二重性:吉登斯对社会学方法论规则的超越[J].河北学刊,2003(3):23-27.